

潘菽心理学理论视野中人的社会化问题

■ 沈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学院,北京 102488)

【摘要】人的社会化问题研究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受到多个学科的高度关注。然而,在人的社会化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重大的理论论争。我国心理学家潘菽在他半个世纪的心理学探索中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以他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为参照,人的社会化领域的一些重大难题尤其是深层机制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到比较透彻的解析,并能得出一些具有创见性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更强烈地意识到文化自觉和理论创新意义的当下,这些观点在人的社会化研究中所蕴含的学术价值、所凸显的意蕴尤其丰富而深远。

【关键词】潘菽 心理学理论 人的社会化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2.02.005

一、前言

人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由社会学家提出的研究主题。就其最基本的含义而言,人的社会化是指个体在其出生之后由一个自然人(或者说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或转变为一个社会人(或者说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过程。具体主要涉及以下内容:经由家庭、同辈群体、学校、就业机构、社区、传播媒介等社会化执行者的影响或塑造作用,通过个体自身的能动选择与内化,个体逐渐获得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接受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养成适应社会的健康人格,掌握服务社会的知识技能,最终能够扮演社会所需要的角色,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社会学所讲的人的社会化在其他学科中也有近似的概念,例如,教育学所称的教化、文化(人类)学所称的濡化(enculturation)等。

由于人的社会化是在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这两种运行机制共同作用之下达成的结果,因此,在社会学更多地对社会教化机制给予探讨的同时,心理学对个体内化机制的研究则更多一些。当然,不排除一些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对两种机制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并形成相应的见解^①。

收稿日期:2021-12-20

作者简介:沈 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社会理论、社会心理、青年问题。

①当然,不同学科有其各自的旨趣,因此,在研究人的社会化时所追寻的具体目标也不尽相同。社会学更多地从合格社会角色的培养来看待人的社会化的作用;心理学更多地从健康人格的形成来看待人的社会化的作用;文化人类学则更多地从人格与文化的适应性来看待人的社会化的作用,等等。

作为一个学术领域,人的社会化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最大的难题是:人的社会化何以可能?或者说,人的社会化得以实现的根本机制是什么?更具体地说,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的心智发展中最基础性的东西是由遗传或生物因素决定的,还是由社会或文化因素决定的?这就是学术史上著名的“遗传与环境”之争。这一论争已经持续很久并且时常因某个学科产生重大成果而又再度燃起论争的战火。实际上,这一问题的第一个层面涉及人的成长或发展的基质问题,第二个层面则涉及更深层的人性问题。

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或最大难题的产生有其十分特殊的时代背景。20世纪20年代初,达尔文学说赢得了广泛的接受,生物进化论成为那个时期时代精神的重要部分,这使得一些学科的学者更愿意偏向于从本能或生物因素寻找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根本动力源。例如,社会心理学学科创始人之一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青年心理学的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发展心理学的重要推动者美国心理学家格塞尔(Arnold Lucius Gesell)等,都是这一方面突出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由于对这种生物决定论的倾向不满,一些学者关注并强调社会环境对于人类心理和行为具有决定作用或塑造影响。例如,行为主义的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提出环境说以反对本能说,其环境决定论孕育了心理学中学习理论流派的诸多形式,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所倡导的社会学习论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出于反对本能说的初衷,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结论高扬文化决定论的旗帜,鲜明地主张人类的心理和行为主要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人类心理或行为发生发展的根源是遗传或生物因素还是环境或社会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对于这一问题或难题的论争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经过长期论战之后,大多数人似乎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即认为人的成长发展首先必须以遗传或生物因素作为前提,其次要受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或社会条件所塑造。然而,这种共识是浅显的。而能够将这两方面进行高度整合,或者说将生物机制与社会机制加以有机统合的理论视野表达或阐述这种共识的学说,仍然为学术界所翘首期盼。

对于人的社会化何以可能这一重要学术问题或重大理论难题,从我国心理学家潘菽所建立的心理学理论视角进行考察和分析,在人的社会化的深层机制方面将可以做出比较透彻的解析,从而得出一些独特的理论见解。

二、潘菽对人的社会化问题的心理学理论透视

潘菽心理学理论观照的人的社会化问题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总结潘菽心理学理论中对于人的社会化问题的原有论述,或者说,直接阐明潘菽对于人的社会化问题曾经提出过的观点;二是借助潘菽心理学理论对于人的社会化问题做出进一步分析,或者说,将潘菽心理学理论深入运用在解决人的社会化问题中。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人的社会化基本内涵的界说

潘菽从社会心理学的视野,尤其是从强调社会对于人的心理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角度来看待人的社会化。他着重指出,“任何人在心理上的成长、发展可以说都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个婴儿所以成长、发展成一定的一个成人,就是因为经过了一系列特定的社会化过程的结果”^[1]。这是他提出的一个具有前提性的观点。

潘菽进而认为,把人的社会化作为重要研究内容的“社会心理学要研究的主要应该是人的

一生的全部心理的发展变化及其一般的表现与他所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的关系。”^①并且,他进一步说明,对人的心理发展和变化所产生的反应及其方式具有影响的社会化因素包括家庭、学校、师友伙伴、社会地位(阶级、阶层、身份等)、居处(城市、乡村、街道等)、集团、组织、文化、民族、国家等,而这一切则是社会心理学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内容^[2]。

由此可见,潘菽关于人的社会化的研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预设,即个体成长发展的有效环境即实际起作用的环境主要是社会环境,而自然环境只是居于次要地位。个体能够成长发展以及如何成长发展,主要依赖于其所经历的社会化过程^[3]。

在人的社会化的具体内容上,潘菽提出了两个实质性的观点,可以在两个层面上体现出来。

第一个层面上的观点涉及人性发展的基质问题,也就是人的社会化的基质问题,核心要点是:人在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其潜在的心理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潘菽看来,一个人自出生之时起,便生活在一种综合性的环境中,这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综合体。基于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角度,潘菽指出,当人类进入到文明时期之后,在其生活的世界中社会环境便成为了主要方面。而在现代社会里,个体一旦出生就必然开始与社会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一方面,社会环境为个体提供了各种生活条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个体也会对社会环境做出种种反应,用行动反馈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正是在与社会环境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婴儿的身心尤其是心理能力得到了重要的成长发展。潘菽强调,事实上,个体的绝大部分心理活动能力或智能都是在出生之后发展起来的。然而,值得高度注意的是,虽然初生婴儿几乎不带有任何心理活动能力,却与生俱来具有一种作用巨大的潜能,即敏于学习、善于学习。个体一生中所得且可以达到较高水平的智能,则要靠这种唯一的巨大潜能,而此外的其他一切能力都是通过个体积习或习染而获得的^[4]。概括而言,在潘菽的理论视野中,人的社会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促使个体所具有的巨大的潜在能力得以发展并且充分地表现出来。

第二个层面上的观点涉及人格模式的形成问题,也就是人的社会化的成效问题,核心要点是:正是由于人的心理能力的不断提高,其外在的行为表现方式才变得逐渐符合社会的要求。在潘菽看来,人的社会化过程不仅促进了个体心理活动能力的发展,而且也能够使个体身上仅存的一些本能行为得以重塑。个体出生之初只能做极少几种本能的动作。随着感官的逐渐发育,他很快就具有了视听能力,一些欲求已能够通过几种情绪表达出来。这些情形在动物身上也同样存在,但是重要的区别在于,人的少数几种本能的机体欲求表现方式也会经过社会化的过程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例如,表现的方式可由直接变间接,由粗鲁变文雅,由显露变隐蔽,由低级变高尚,由直率变委婉^[5]。或者说,个体的人格行为模式在生活中受到了文化的塑造。概括而言,在潘菽的理论视野中,人的社会化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促进个体从一个生物人朝向一个社会人的质变。

(二)关于人的社会化理论的哲学方法论

潘菽一直强调,正确的方法论对于心理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在他看来,心理学的方法论主要是指心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因此,不能将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等同起来。然而,要选择和运用什么样的具体研究方法又必然与方法论的指导作用相关

^① 潘菽还指出,既然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与人的心理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有关的所有社会因素,那么社会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他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到社会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中去寻找。发展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从幼到老的成长过程中较为细致的情况及其各种规律,其中也包括一些有关社会因素的方面。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以与全部心理学分支方面(也包括发展方面)有关的所有种类的社会因素或条件为主,虽然也涉及到心理的发展方面及其他方面,但这些方面只属于次要的研究对象。参见潘菽:《试论社会心理学》,载《百科知识》,1983年第1期。

联^[6]。实际上,任何一种学科理论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导,而其中又会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某种价值取向。

潘菽指出:“心理学是研究人自己的一门主要学科,而要研究人,就必须首先对人的实质问题有一个基本正确的看法,这样才能使心理学研究找到一种恰当的出发点。”^[7]潘菽关于人的社会化的心理学理论中的哲学观和价值论,用他独特的理论表述就是人贵论。人贵论就是“认为世界上人最可贵、作用最大的一种理论”^[8]。这种既是哲学观又是价值论的人贵论表现出了充分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

基于长期的探索研究,潘菽指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有一种关于人的实质的正确思想,他将其总结为人贵论。根据潘菽所做的文献考证,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泰誓》中写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一直宣称的“人为万物之灵”的最早表述。而《孝经》中“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孙膑兵法·月战》中“问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王充《论衡·诂术》中“夫人之在天地之间也,万物之贵者耳”,《曹操集·度关山诗》中“天地间,人为贵”,王夫之《尚书引义·洪范三》中“天地之生,人为贵”等,都是人贵论思想的代表性表述。中国古代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把人 and 禽兽明确区分开来的。这种观点成为中国整个古代思想中一直绵延不绝、传承至今的最独特的传统^[9]。

人贵论的基本思想在于,在世界万物中,人是最可贵的,能起最大作用的,而人的可贵之处则在于其有智慧。因此,人贵论和“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具有同义性。

潘菽认为,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蕴藏着一些重要的、闪烁光辉的理论,但人贵论则是最根本的一种。原因在于,如果不懂得人的独特和宝贵,就不可能在对于人的研究上具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如果把入仅仅看作动物,把人等同于是一部复杂的机器^①,那就不可能对入形成本来应有的科学认识^[10]。

潘菽强调,从心理学的视野来看,人之所以最为可贵,主要是因为人能够有发展到很高程度的心理活动,而心理学正是研究人之所以变得最可贵的实质所在的科学。因此,人贵论是心理学最为需要的一种根本思想。“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会把人和动物以至一般生物混作一谈,以致使心理学模糊了或完全忽视了自己最核心的课题”,而“心理学如果看不到人是世界万物中最可贵的东西,就会忽视它自己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即阐明人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和所发挥的最重大作用。”^[11]

可以说,潘菽以人贵论这一哲学方法论作为指导,在他关于人的社会化的心理学理论视野中,始终把具有高度发展的智能看作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并具体将这种观点贯彻到他关于人的社会化理论的各个层面。于是,他便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化过程不仅是促进入的智力潜能得以高度发展和展现的决定性条件,而且是促使个体从一个自然人发展变成一个社会人的最重要力量。

(三)关于入的社会化的主体机制的理论

人贵论作为哲学方法论,在探讨入的社会化问题时解决了应该重视入的最重要的主体性即入的潜在能力、入的最大作用的研究价值取向问题,而对于入的社会化得以具体实现的主体机制问题,潘菽则是通过另一个重要理论视角来加以解释的。

入的社会化的一个前提性理论难题涉及主体性的机制问题——人性的形成,具体而言,心理或行为发展的根源在于遗传基因的作用还是在于环境教化的作用,或者说,生物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哪一个是决定性的力量?潘菽对于入的社会化理论的一个独特贡献得益于他在探索

^①生物决定论倾向鲜明的心理学理论,如弗洛伊德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把入仅仅看作动物;而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如华生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把入等同于一部复杂的机器。

中有效地解决了关于人的发展的最重大难题时所发展的实质理论。这也正是潘菽心理学思想中极其深刻的地方,同时也是最具有创新性的地方。

在20世纪40年代,潘菽就已经初步形成了性习论的思想雏形。当时心理学界存在两种极端倾向:一是一些人滥用本能概念,视之为一切行为的根源;二是一些人反对本能概念,认为一切行为的根源在于学习过程。在潘菽看来,习得行为与非习得行为之间存在区别不可否认,因此,必须用相应的概念加以分析说明。他指出:“动物的一切行为都是发展的过程的产物。但发展的过程有两种,一种是学习,一种是生长。由学习而养成的行为叫做习得的行为,由生长使有关的器官达到成熟而形成的行为可以叫做生成的行为。这两种不同的行为在发展这一点上是相同的、统一的,仍是两种发展的性质上颇不相同的行为,在事实上需要加以区别,而不能混淆。”^[12]

潘菽在对国外心理学理论关于人的发展问题有关论争的思考中,基于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综合和探新,提出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理论——他称之为性习论。潘菽指出,性习论是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所探讨的基本问题是人的机体特性的具体表现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根据潘菽对有关文献的研读和梳理,《古文尚书·太甲篇》中有“习与性成”之说。传说是商代伊尹对年轻君主太甲的诫言。清初王夫之将其解释为:一种习形成的时候,一种性也就与之一起形成了。所谓“习”,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一定措施和一定教导条件下的有意学习;二是指习染,即一个人在生活实践里与他人交往中所获得的经验积累和智能增长。所谓“性”,也就是人的性能,指人的能力、创造性、技能、知识、性格等^①。

在潘菽看来,“习与性成”是我国古代思想家讨论得最多,十分可贵的科学论断,有待进一步发扬光大^[13]。根据他的研究,孔子就很重视习与性的关系,且十分强调“习”。例如,《论语·货阳》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家语》曰:“少成若天性,习贯(惯)如自然。”在春秋战国时代,“习与性成”是一种流行的思想。到了汉代仍然流行。宋明清时期也有一些思想家对其做出了自己的阐释,从不同角度加以发展^[14]。

潘菽指出:“习与性成”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一种基本观点,有可能使心理学上一直纠缠、苦恼着许多人的所谓遗传与环境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而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就在于确认所谓的“性”有两种:一种是由生长而来的生成的性,也可以称为生性;另一种是人出生以后由学习或习染而来的习成的性,也可称为习性。在人类心理中,生性只有很少几种,习性则是大量的^[15]。因此,人类通过学习而发展其心理能力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无限的。

潘菽还进一步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性”作为内因,就不会有某种“习性”的发展,这就是“习性”和“生性”的辩证关系。这里的深层意涵在于,人的社会化是以自然因素作为基础,经过社会学习和社会实践而成就的。但总的来说,无论“生性”还是“习性”,都是一定的(简单的或复杂的)发展过程的产物。既然如此,人在整个一生中,已有的“性”都会随着一定的发展过程而改变——消亡或增强,且还可能形成新的“性”,而绝不会一成不变^[16]。这里更深层意味是,人的社会化是持续一生的不懈过程。

三、总结与评论

潘菽历来主张若想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首先必须把事关这一学科全局的基本理论问题阐释清楚,他将此看作心理学能够得以健康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故此,他长期致力

^① 参见《潘菽全集》(卷七),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8页;潘菽:《心理学简札》(卷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01-908、927-930页;潘菽:《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99-116页。

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并努力推动理论心理学的发展。而在人的社会化这一重要领域的探索方面,潘菽也同样充分地表现出其一贯主张的理论逻辑的演绎进路。

对于人的社会化这一领域的内涵和外延,潘菽给出了自己的独特界说,人的社会化的基本意涵包括:从基质变化上说,社会化可以促进人的潜在心理能力得到极大程度的开发;从外在成效上说,社会化可以促进个体的人格模式或行为方式变得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

潘菽以人贵论作为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从而在根本上区别于西方传统心理学的生物学取向和机械论取向来研究人的哲学方法论,确定了从尊重人的至高尊严价值、主体能动作用的角度来认识人的成长和发展的基础和规律的价值论取向。而人与生物和机器的最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具有潜在的可以达到高度发展水平的心理能力。这一点对于解答人的社会化之所以可能这一问题则是关键性的。

潘菽从习性论出发,破解了心理学尤其西方心理学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的关于人的心理发展根源上遗传与环境(或生物性与社会性,或本能与教化,或先天与后天)之间关系的难题,深刻地回答了关于人的社会化之所以可能的主体机制问题。这是潘菽心理学思想中的独到之处,也是中国心理学家对于世界心理学甚至更广泛学科的学术难题上的理论贡献。

建立中国的心理科学是潘菽由来已久并长期努力的理想目标。早在20世纪30年代^①,他就提出关于学术中国化的主张^[17],并努力倡导心理学要开展切合中国实际、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他指出,我们需要的心理学,不是一种超然的东西,不能与社会实际脱离关系。换句话说,不能把德国的或美国的或其他国家的心理学尽量搬来了就算完事。我们必须面对我们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研究心理学的理论方面应该如此,研究心理学的应用方面更应该如此。……所以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提倡应用心理学,还要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18]。可以说,潘菽在很早的时候就对心理学学科发展状况的深刻思考和问题意识中产生了鲜明的文化自觉。

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潘菽更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他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心理学学科的主张及其践行方案^[19]。他的文化自觉不仅在思想上更加成熟,而且在践行中形成了相关的成果。

今天,在中国学术界更强烈地意识到文化自觉和理论创新意义,尤其是强调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时候,潘菽的先驱性思考与探索,具体到本文主题而言,他的有关思想在人的社会化研究领域产生的学科价值及其做出的学术贡献,凸显的不仅仅是治学启迪,更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远的时代意蕴。

[参 考 文 献]

- [1][2][3][4][5] 潘 菽:《试论社会心理学》,载《百科知识》,1983年第1期。
[6] 潘 菽:《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方法论》,载《心理学探新》,1985年第1-2期。
[7] 潘 菽:《论人的实质的自然方面——新三界说》,载《心理学报》,1985年第1期。
[8] 《潘菽全集》(卷七),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页。
[9][10][13] 潘 菽:《心理学简札》(卷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37、895-896、901页。
[11][12][17][18] 《潘菽心理学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143、62、37-52、22-28页。
[14][15][16] 潘 菽:《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111、18-19、119-120页。
[19] 潘 菽:《面临着新时期的我国心理学》,载《心理学报》,1979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俊华)

^① 1926年潘菽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7年学成回国,应聘到成立心理学系最早的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为中央大学)任副教授,半年后晋升为教授,兼任心理系主任。